

十三經注疏

春秋公羊傳注疏

〔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春秋公羊傳注疏

〔漢〕何休 解詁

〔唐〕徐彥 疏

刁小龍 整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公羊傳注疏 / (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
刁小龍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
(十三經注疏叢書)
ISBN 978-7-5325-6985-4

I. ①春… II. ①何… ②徐… ③刁… III. ①中國歷史—春秋時代—史籍②《公羊傳》—注釋 IV.
①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81830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十三經注疏叢書
春秋公羊傳注疏
(全二冊)
[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
刁小龍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39.625 插頁 12 字數 1,118,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50

ISBN 978-7-5325-6985-4

K · 1768 平裝定價: 1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編纂委員會

顧問

(按姓氏筆畫爲序)

任繼愈 李學勤

湯志鈞 蔡尚思

主編

張豈之

周天游

王興康

金良年

執行編輯

王立翔

呂健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

張豈之 周天游

十三經是儒學的基本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影響至深至遠的重要文獻之一。在中國古代，堪與十三經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對這兩大文化支柱，無論是諸子還是詩文，其中雖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歷史舞臺的邊緣，難以撼動其中心的地位。

如果說二十四史是以記實爲本，縱貫古今，鑒往說來，宣彰資治，更多發揮的是實用的鏡鑒的作用，那末十三經則是整個封建社會的靈魂。自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設立五經博士，立於學官之後，直至清代，經學一直是歷代統治者製定國策的理論依據，是士農工商各色人等齊家立身的行爲規範。不僅如此，十三經還被法典化，於是有了「春秋斷獄」，「禮」成了「禮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於是儒學成爲國學、國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廣到所有官私學校之中，又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包括目不識丁之人在內的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的思想與行爲。所以每當社會發生重大變革之際，總有人視其爲障礙，爲糟粕，必欲除之而後快；相反，也有人尊之爲聖典，爲良方，藉其足以安邦定國。時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從這一意義上講，不瞭解十三經，就不可能真正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瞭解中國。特別是上世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之後，客觀上的確起到了振聾發聵、除舊迎新的作用，經學的地位開始一落千丈。然而正如在倒掉髒水的同時也倒掉了嬰兒一樣，十三經中的精華也同糟粕一道被棄置，殊為可惜。更為可怕的是，其中的許多糟粕並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又往往借尸還魂，死灰復燃，為害社會。所以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中華文化遺產更加珍視，開始呼喚讀經，呼喚科學的讀經，呼喚經學研究者在嚴謹的批判與借鑒中，讀懂十三經，使經學中的合理內核與有益營養，跟現代社會達到真正的和諧與交融，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正是基於此，我們纔萌生出整理出版新版十三經注疏的最初願望。

「經」本指經綫，是布帛等織物的綱，並引申出提綱挈領、傳之久遠的含義。於是作為基本典籍常相傳授的書，便被稱作「經」。「經」本非儒家典籍所專有。最早被稱為「經」的書是墨經，也就是墨子。墨子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此外，管子、韓非子也稱為「經」。儒家之書被稱作「經」，也始於戰國，那就是「六經」。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又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湖北荊州郭店所出竹簡中所記「六經」經名與順序，證莊子所言不虛。這「六經」的順序保持到西漢前期。(一)

「六經」是夏商周三代禮制文明的結晶，大體成型於周代。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上下陵替。隨着周王室的衰敗，「六經」也失去往日的榮耀，被棄之不用。而諸子百家乘勢而起，為新興的貴族出謀劃

策，變法圖強。孔子尊崇周制，潛心整理「六經」，試圖恢復周禮所提倡的等級秩序，以平息紛爭，因逆潮流而動，便到處碰壁，甚至陷入「惶惶若喪家之犬」的境地。當時，儒學並非顯學，「六經」也不神聖。秦併六國，天下歸一。秦始皇以法立國，一度焚書坑儒，儒家又遭沉重打擊。幸賴秦博士所藏及民間所匿，於漢初衆經纔得以復出，而樂經已亡，僅餘「五經」。漢武帝之時，國力達於極盛，新的統治秩序得以鞏固，赤裸裸的法治或清靜無爲的黃老之學無法滿足新秩序的需要，從此神學化的儒學脫穎而出，登上獨尊的國教地位。兩漢之際，「六經」順序有了微妙變化。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略所刊爲：易、書、詩、禮、樂、春秋。這順序沿用至今。而之所以有此改變，可能與劉向、劉歆當年整理文獻排列諸經成書年代次序有關。東漢時，加入了論語、孝經，除去已佚的樂經爲「七經」。唐時有「九經」之說，未見確論。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言，至唐文宗太和年間（八二七—八三五）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有了實指，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了宋代，經朱熹等理學家的推崇提倡，孟子進入「經」的行列，於是「十三經」始全。

十三經的成書年代，至今爭論不休。然而易經、尚書形成於西周；詩經始於西周而成於春秋；儀禮、周禮、禮記基本編定於東周，漢代有所變更；左傳、論語、孟子、爾雅成書於戰國；孝經古本完成於戰國，而改定於漢初；公羊傳、穀梁傳寫定於漢代，基本內容源出於孔子弟子之說，還是大體可信的。

中國經學的研究，從漢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之久。西漢時期，今文經控制學壇。王莽代漢，古文經學抬頭。進入東漢，更一發不可收拾，經馬融、鄭玄等大家的推動，經今古文合流，但古文經處於上

風。魏晉學術爲之一變，玄學成爲顯學。而到了唐代，漢學重新流行，並以古文經爲基礎。宋時疑古之風大盛，理學一統天下，至明而不墜。清代則提倡樸學，輕虛言，重實證，追本溯源，漢學由是復興，經學研究也達到頂峰。那時相關著作，接踵問世，如納蘭性德匯刻之通志堂經解、阮元輯刻之皇清經解、王先謙輯印之皇清經解續編，動輒收書數百種，總卷帙超千卷，其他專著則數不勝數。當然影響最大、流傳最廣且久的，仍當推阮元主持修訂的十三經注疏。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卒，享年八十六歲，謚文達。據清史稿阮元傳所載，「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勅編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再入翰林，創編國史儒林、文苑傳。至爲浙江巡撫，始手成之。集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二種，撰提要。」又曰：「歷官所至，振興文教。在浙江立詁經精舍」，「在粵立學海堂」。「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百八十餘種，專宗漢學，治經者奉爲科律。」

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始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刊成於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可謂神速。不過其準備工作則在嘉慶四年（二七九九），在浙江創辦詁經精舍之時，當時他糾集段懋堂、何元錫、顧千里、徐新田、臧在東、孫雨人、李尚之、嚴厚民等知名學者，分撰十三經校勘記，奠定深厚基礎，所以新本一出，倍受歡迎，享譽至今。

阮刻本雖稱善本，却並非無懈可擊，其存在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

一、選用底本不當。阮刻本以「重刻宋本」爲名，實際所用乃元刻明修之南雍本，此本雖原出宋季建刻附音本，遞經修補，續有糾譌，然轉相承訛之處多有，阮校因之失誤之例甚多，因此，實非整理首選。相反，始於南宋初年浙東茶鹽司刻本之周易、尚書、周禮三種，繼以紹熙中黃唐刻毛詩、禮記二種，因半葉八行，故稱八行本。而經注及義疏合刻始於是本，書名題有「注疏」之稱，亦始於是本，勘刻之精審遠在十行本之上。以周禮、禮記爲例，因十行本錯而八行本不誤，阮刻校勘記可以不出者，大約在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卷無例。如尚書依正義作二十卷，儀禮依正義作五十卷，而周易則依經注本作九卷，與正義作十六卷異。又毛詩也依經注本作二十卷，却非正義作四十卷之舊。或依或違，所爲無定，遂使唐宋義疏原卷不可得以詳。

三、主事者意見不合，各執己見，勢同水火，正確建議未能採納，而致謬種流傳。如顧千里與段懋堂之爭，事涉臧在東、何元錫二人，以至顧氏出走，爲張古餘刻儀禮注疏，以成己志。

四、急於呈送，校對未精。因阮元陞任兩廣總督，江西之盧宣旬以「創始者樂於觀成，板甫就，急思印本呈制軍，以慰其遺澤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書一出，頗有淮風別雨之訛」。(二)

有鑒於此，西北大學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發起，於一九九二年成立了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的編纂委員會。編委會草擬了有關的方案與體例，並約請國內十餘名中青年才俊，參預點校整理工作。各經均追本溯源，詳加考校，或採用宋八行本爲底本，或以宋早期單注、單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爲底

本，在盡量恢復宋本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來彌補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對經學研究、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動作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但由於種種原因，有關工作遷延至今，這是我們深為遺憾之處。

又當代缺乏經學大家，是客觀事實。今預役諸君各有特長，成果頗豐，但均有先天不足，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本項工作一直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二〇〇八年八月修訂

〔一〕參閱蔣伯潛十三經概論、楊伯峻經書淺談導言、周予同經學歷史序言、李學勤經史總說，下同，恕不一一注明。

〔二〕見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載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四頁，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又參閱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載文史第三輯。

校點前言

版本的求真和求善，不僅是文獻版本學理論的爭議所在，同時也影響到歷代版本刊刻與校勘等實踐工作。不同理念之下的版本重刊與校勘整理形成了衆多版本，歷史地反映了人們對於版本求真和求善問題的思考探索歷程。此次十三經注疏整理工作目標在於恢復經籍注疏舊貌，力在求真，反映近年來學術界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春秋公羊傳注疏整理工作就在這一原則之下進行。

經學注疏的傳習與研究無不以文獻整理爲最基本前提。版本刊刻與校勘整理的重要性於此也可見一斑。不過，既然對於版本求真與求善仍存疑問，那麼，這一整理工作也只能爲經典研讀和相關研究提供一種文本參考，而不能作爲根本依據而決定研究結果。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一、注疏源流

春秋公羊學發生在漢代，是西漢經學的主流。歷史上，春秋公羊學經歷了由繁盛轉而衰落，甚至湮沒無聞，及至清代重新崛起的戲劇性發展過程。

舊說以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公羊疏引戴宏解疑論）據此，今本公羊傳寫定于漢初之際，基

本內容乃出自孔子弟子之師說因襲。因無更多依據稽考，姑且仍以此說爲據。

公羊傳原本單行而與春秋經別載。漢書藝文志載經十一卷，又載公羊傳十一卷，正是如此。漢末熹平石經也僅有傳文而不錄經文，但以紀年爲識別。是知傳自別經，不相連綴。東漢末季，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宣明公羊學大義。其釋兼備公羊經傳文字（從段熙仲說，參看氏著春秋公羊學講疏），然其書一仍十一卷之舊目：閔公卷二年何休注「繫閔公篇于莊公下」云云，可爲證。隋書經籍志載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而經典釋文序錄始著錄十二卷，其所差異者在僖公卷之分卷：「釋文之公羊音義僖公十六年條下云「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唐開成石經初刻時，「公羊分十二卷，後併閔公于莊公卷，而公羊僅十一卷」，「閔公第四標題下增刻雙行小注云附莊公卷」，僖公至哀公標題下增刻卷四至卷十一，而卷尾標題亦皆磨改作第四至第十一」（嚴可均唐石經校文）。唐宋以降，諸書目著錄，則多以春秋魯十二公每公一卷，適成十二卷之數（唯鄭樵通志著錄其書從十一卷之舊）。

何邵公作春秋公羊解詁之際，已將春秋經與公羊傳合附，是其時經傳文字已非別行（從段熙仲說）。四庫館臣疑「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非是」。魏晉之際，爲經傳與何休解詁一併作義疏，俱作訓釋。唐初整理魏晉學術，承而沿用，此後遂爲定式。然而，魏晉以降，經古文學漸盛，而史學發達，春秋學轉而推崇左傳，公羊學漸漸退出歷史舞臺。更此以降，春秋公羊學幾爲絕響，更乏學者問津。經典釋文序錄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隊絕，故爲音以示將來。」隋志亦云：「至隋，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五代迄趙宋，版刻始興，公羊傳雖存其間，但流傳不夥。直至清代重新宣導經學，漸以

今文經學抬頭，春秋公羊學乃得重新廣大。經由常州學派莊存與等學者著述立說，至晚清康有為、廖平等人極盡恢弘，一度蔚爲大觀。而民國以來經學衰頹，春秋公羊學更莫能外。

今天通行刻本春秋公羊經傳注疏（附音義）是用東漢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和魏晉南北朝佚名所作義疏（作者爲北朝大儒，其中文字入唐後曾有修訂整理，茲據重澤俊郎、潘重規等考證）以及陳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公羊音義三部分組成^①。

版刻之興，春秋公羊傳解詁單行付梓，是所謂單經本。繼而經典釋文之公羊音義補刊其後。南宋時，始將音義文字分拆附於經注文之下，而經注疏匯刻本遂又本此合爲一編。又公羊疏原本別行，刊本之初始始于北宋咸平三年校定諸經疏及正義之際，時「凡賈公彥周禮、儀禮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楊士勳穀梁疏十二卷，皆校舊本而成之」（玉海卷四十一「咸平孝經、論語正義」條下），餘有孝經、論語、爾雅等。至咸平四年十月九日，「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具矣」。是後，景德、大中祥符年間又有詳校重刻（參看玉海卷四十三「景德群書漆板 刊正四經」條下）。單疏本歷代書目罕有著錄，而本邦失傳已久，清四庫館臣已不知其詳。所幸有東瀛抄本一仍其舊貌（今存蓬左文庫，有杉浦豐治整理校記）。

十三經注疏萃刻祖本，莫先於越刊八行本；然僅錄經注疏文字，而音義不附其中，也無春秋公羊傳注疏。此後南宋建陽刊刻附音義十行注疏本，乃據經注并公羊音義分附本再加單疏本而成。此爲春秋公羊

① 經典釋文之成書近有新考謂入隋之後仍有續作。參看孫玉文經典釋文成書年代新考，收錄中國語文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傳注疏附音義匯刻之祖。匯刻之際，不僅相關單疏分附經傳注文之下，篇卷也已改作二十八卷，別于經傳注本與單疏本篇卷（單疏本分卷可據日本單抄本知）。此十行注疏本刊刻後迭經翻刻，元、明以下或略有行款改動而文字並承之。清代阮元重刻宋刊十三經注疏亦即以此爲底本。

二、底本選擇

春秋公羊傳注疏因無八行本，只能就十行本進行整理。宋刻十行本不傳于世，傳世者不過元刻遞修本而已。雖然阮元刻本也是以元刻本爲底本，但阮刻已經校勘，加之手民之誤，已喪底本原貌。因此，此次重新整理校點春秋公羊傳注疏，遂棄阮刻本而徑用元刻遞修本。元刻遞修本今日有影印本公諸世人者：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與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京文物局藏本（前二者請參看相關機構漢籍電子網頁）。據筆者檢覈所知，三本文字大同，甚至補版亦多相同，蓋因諸本之印製時期相去不遠所致。

阮刻本之不足，學者已略言之，今擇取兩端備述如下：一、阮元刻本之錯誤。關於這一點，阮元其時已有清楚認識。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五「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成」條下其子阮福注云：

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大人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爲善也。（又收錄阮元研經室二集卷二江西校刻本十三經注疏書後文後案語）

嘉慶刻本之主事者乃盧宣旬。上引「校書之人」云云即爲盧氏所發。阮元、福父子所云「刻宋本」（即指盧刻本）之錯謬，筆者在整理公羊注疏時，亦有體認。而後文所云「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指盧氏附錄宋本之後對阮元等所作十三經校勘記東擇補充。阮元弟子嚴傑亦斥其非：

近年南昌重刻十行本，每卷後附以校勘記，董其事者，不能辨別古書之真贋，時引毛本以訂十行本之訛字，不知所據者乃續修之冊。更可詫異，將宮保師校勘記原文顛倒其是非，加「補校」等字。
（皇清經解本周易校勘記末附記）

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廣爲流佈，而各卷末所附者即盧氏摘補之校勘記文字。今北京大學整理本誤此爲阮元等所作之校勘記，是亦未察。

二、阮元刻本校勘參校諸本以及取用他人校勘成果之疏漏。下文略檢討阮元校勘記整理所據諸底本，說明之。

按阮元參校之本，根據書前目錄所示，有如下諸本：單經本；唐石經春秋公羊十二卷；經注本；經典釋文公羊音義一卷；注疏本；惠棟校本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監本附音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閩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監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毛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浦鏜春秋公羊傳注疏正誤四卷。

前揭諸參校本之中，單經本所依據爲唐石經本。實則，唐石經「其經字在大和時已有改刻，乾符時有

修改，朱梁時有補刻，北宋時有旁改添注」（張國淦歷代石經考之唐石經提綱），拓本則有明嘉靖拓本、清乾隆以前未裝冊本及乾隆後摹本，但「都補綴可疑」（同上），時至今日也未能有充分、徹底的整理研究。據此，唐石經本文雖可用於參校而難爲圭臬以判定文字。而阮校每以石經文字定尊校勘內容，實可商榷。

又注疏本下，阮元有按語云：

何煌字仲友云：「康熙丁酉假同門李廣文秉成所買宋槧官本手校，再令張翼庭、倪穎仲各校一過。」惠棟云：「有曹通政寅所藏宋公羊，合何氏所校宋槧官本、蜀大字本及元版注疏，並參以石經，用朱墨別異。癸酉冬月識。」按惠云「朱墨別異」者，今不能詳。大約鄂州官書經注本最爲精美。

由此可知，阮刻本經注本無所參考，不過轉錄何煌、惠棟等人所校訂宋本、鄂州官書本而已。實則，與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同時，世間并有撫州公使庫刊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與建陽余仁仲刊本流傳。細考阮元校勘記中文字，也有宋本（即前揭撫州本）、余（仁仲）本、蜀大字本等過錄，不過因阮校并未真正寓目諸本，故此實難稱參考。諸本之中蜀大字本與鄂本已經失傳，而阮校引據鄂本內容較爲詳細，或有勝阮元所見各版本者，故爲阮元校勘記備加推崇。實則，傳世兩經注本與阮校所據鄂本刻本系統與文字優劣，或有參差，鄂本既不可盡信，亦更需旁參其他經注文字（以上參看拙文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版本小識，收錄國

學學刊，二〇一〇年第四卷）。

至於單疏本更爲阮元所未知見，固付之闕如。單疏刻本雖僅存殘帙七卷，但行款信息、文字內容彌足珍貴，東瀛所見雖爲抄本，然卷數仍一存古真，文字亦足可寶。

此外，阮元對此相關校勘著作，如齊召南等所著殿本考證、浦鏜十三經注疏正誤等雖有東擇而未能正視，或失諸稽考，也是其疏漏所在。筆者參照諸本，知其中實有可據訂正注疏文字而爲阮校遺漏者，則阮氏去取不無可商之處。

再就阮元校勘記言之。關於阮校的體例，孫詒讓在周禮正義凡例中曾有批評說：「俗本訛文塵穢簡牘，非例也。」職是之故，此次參校在吸收阮校的同時，也略作了處理，刪汰蕪雜，精簡文字。尤其阮元校勘記中博引惠棟九經古義、臧琳經義雜記等考據文字說明經傳異文、通假，雖然有助經傳理解，實則有失校勘體例，今并予以省略。

三、參校資料

此次整理工作，除參考阮元校勘記（阮校有文選樓與清經解兩種刊本，互有得失，筆者已參酌校訂）之外，其他參校資料如下所示：

撫州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附公羊音義一卷

撫州公使庫淳熙二年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即前揭阮元校勘記中之宋本。此書明代曾爲著名學者陳仁錫和常熟大石山房孫氏收藏。卷端鈐有「陳氏明卿」和「孫朝讓印」二硃記。明末歸於毛氏汲古